

周恩來

保健醫生
回憶錄

1966-1976

張佐良著



周 恩 來 保 健 醫 生 回 憶 錄

1966-1976

責任編輯 姚永康

封面設計 陸智昌

書 名 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

著 者 張佐良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1998年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 (140 x 203mm) 19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480·2

© 199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圖片承蒙張佐良、力平、曹應旺先生提供。

作者簡介



張佐良，1932 年出生於上海。1937 年爆發“八·一三”淞滬戰爭時，頃刻間家破人亡，成了孤兒，並一度流浪街頭；後被人領養到江蘇啟東海門地區。

1947 年在當地參加新四軍；1952 年由部隊轉業到上海補習文化；1953 年參加全國高考，考取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本科。

1958 年，畢業後便到中醫學院“西醫學中醫”學習班學習中醫。

1962 年初，到北京醫院從事臨床醫療工作。

1964 年起，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醫療保健服務。

1965 年至 1976 年，任周恩來總理專職保健醫生。

曾任中央警衛局保健處處長、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內科主任醫師。

目 錄

1	鄧穎超初次約見並叮囑：千萬不要叫我們“首長”.....	1
2	西花廳。“第二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	8
3	鄧小平的一次“驚險”.....	16
4	辦公室門鎖有3把鑰匙，鄧穎超卻沒有1把； 鄧穎超也有抱怨，但夫妻倆終生相濡以沫絕非偶然.....	23
5	“思想兵”和“主義兵”揚言要砸爛“廣交會”。 周恩來急赴廣州，持續84小時未眠.....	35
6	武漢“七·二〇”事件。毛澤東取消暢游長江， 周恩來再次赴武昌解圍.....	44
7	“我按東方人的習慣生活！”.....	52
8	大國總理的一日三餐.....	57
9	周恩來的性格脾氣和人格魅力.....	67
10	“你干預我最高政治生活！”.....	74
11	“蛋炒飯裡為什麼不放鹽？”.....	82
12	江青服“安定”也要纏上周恩來.....	87
13	周恩來坐鎮大會堂處理“九·一三”事件， 又是50小時未眠.....	92
14	尼克松訪華前夕，毛澤東突然病危；周恩來主持 搶救工作，並說：“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100
15	四個紅細胞的背後.....	105
16	尿血之後.....	113
17	“他們明明是整總理嘛！”.....	117

18	“大法官”、“陪審團”、“小護士”	122
19	輸血 89 次，王洪文干擾治療	128
20	張春橋竟要修改病案	132
21	終於住進三〇五醫院	138
22	組閣之爭與長沙之行	143
23	毛澤東說：“總理還是總理！”	151
24	馬克思的請柬，我已經收到了	156
25	吳階平：“要實事求是地告訴總理。” 鄧小平：“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61
26	周恩來的最後囑託	165
27	康生病危時去看望周恩來，留下難解之謎	172
28	1 月 8 日早晨	176
跋	楊匡滿	185

1 鄧穎超初次約見並叮囑：千萬不要叫我們“首長”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醫院總值班室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通知說是鄧穎超大姐約見我。我雖然經常出入中南海工作，那種初到中南海時的神秘感和好奇心亦因受到各種教育和眼界的開闊而漸漸代之以責任感和工作壓力。

但我去西花廳還是第一次。

領導上決定派我到西花廳工作而同我談話時，我感到有點緊張，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對組織上分配的工作歷來只有服從的義務，從沒有過討價還價，更何況要派我到周總理身邊去工作，是組織上對自己的信任。我曾聽“海裡”的朋友說起過，周總理對人對事十分細緻和嚴厲，不知道自己能否適應得了這樣的環境，把工作做好。

不過，我熱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時，對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健康情況及西花廳工作的要求都說得十分詳細，為的是讓我盡快熟悉和適應西花廳的工作環境。他這樣做，既出於自己的責任心，也是對我的關心、愛護。應該說，我對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來對工作極其認真細緻，他辦事情既嚴格又雷厲風行，他批評任何人時都不講情面，這在“海裡”工作的人們都是知道的。

再說，周恩來視時間如生命；對他來說，的確是“寸金難買寸光陰”。他沒有時間，絕對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諸如健康檢查或去醫院看病這類事情上。

此外，人們只要一提起周恩來的工作，都會說他沒有白天還是黑夜。他能加班加點的工作，連續“熬夜”幾天幾夜。可以說，這在黨中央領導人中，恐怕很難有能夠超過他的。

鄧穎超大姐曾講過一個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慮請劉伯承給恩來當參謀長，劉帥知道後忙說：“恩來熬夜的本事實在大，我可熬不過他，還是另外請人吧。”周恩來聽說後並未介意，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醫生要跟上周恩來的工作與生活節奏，必須掌握好“火候”，即盡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實際上很難說有什麼“空隙”可言），或者說是不太“忙”，情緒比較輕鬆，起碼少影響他工作的情況下，設法得到周恩來對保健工作的“配合”與“默契”。這可算是保健醫生工作的“技巧”，相當重要。在這方面，鄧穎超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好周恩來的保健醫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說是在照料周恩來的醫療保健工作上盡了一點心力。

中南海裡要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挑選符合要求的服務人員，有關部門考慮政治標準第一是應該的。這不僅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或者西方國家也都這樣做。

因此，幹部部門對被遴選的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是絕對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自己所以被選為周恩來的保健醫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紅”，是紅小鬼出身，曾在多位中央領導人

身邊服務過以及有人推薦等因素以外，我學習過3年中醫，大概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很好的中醫。鄧穎超十分敬重她的母親，她也很相信中醫，常請著名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她本人看中醫、吃中藥常年不輟。

鄧穎超約見我那天，我騎着自行車急急忙忙由北京醫院趕到西花廳時，周恩來還沒有起床。總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將我引進客廳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廳西牆邊豎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鏡。我站在那兒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扶正了眼鏡，仔細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這時，我心裡正在想鄧穎超大姐約我來之前，肯定已看過我的檔案材料，她還會從各方面了解我的情況。她現在叫我來，諒必是為慎重起見，要親自見見我這個人；通過與我交談，對我有更多的觀察和了解。這畢竟是要為周恩來物色一個成天跟隨在身邊工作的保健醫生，她也想“選”得準一點。

只等了片刻工夫，鄧穎超從她的辦公室向客廳緩緩走來。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並輕輕攙扶着她坐到小沙發上。

鄧穎超已在家養病多時。她身體一直不太好，年青時得過肺結核。她顯得瘦削而虛弱，面部氣色稍有點蒼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

“你是張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見見你，因為身體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這兩天天氣太熱，你是騎自行車來的吧？”

“是的。”我答道。

“你在這裡不必拘束。”她見我有點拘謹的樣子便這麼說。

“先喝點茶，咱們慢慢聊。”她又說道。

大姐說話聲音輕微，慢條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話音帶着一口

好聽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說話一面從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遞給我。鄧大姐的和藹可親消除了我來西花廳之前的緊張心理。她在簡短地詢問了我的家庭成員及個人經歷後，關切地說：

“你從小沒有爹媽是個孤兒，吃了不少苦，15歲參加革命隊伍又是個紅小鬼。你大學畢業，當上了大夫，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體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藥，是個藥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個治病救人的崇高職業。”

鄧穎超介紹了周恩來的健康情況和性格，告訴我怎樣同周恩來相處。周恩來的工作非常忙，要求為周恩來做事的人必須見縫插針，注意工作方法，不要隨便去干擾他，否則，你有再好的動機也達不到良好的效果。假如遇到什麼不好解決的事情，她會盡力幫助我的。最後，她向我介紹了西花廳工作人員的情況。

鄧穎超的這一番親切、坦誠、理解與關心人的談話，使我消除了不少思想顧慮，對日後做好工作樹立了信心。

稍停後，鄧穎超向我介紹了自己的健康狀況。她正患着膽道疾病、輕度甲狀腺機能亢進、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和過敏性結腸炎等多種疾病；睡眠差、食慾欠佳、消化不良，體重不足60斤。說話間，我見她不時用手帕擦汗，並有一點氣急。

“今天說話時間太長了，請大姐先休息吧，別累着了。”我建議道。

“有點累，但還好。你隨我到房間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會兒。”我待她說完便扶她進臥室躺下。

鄧穎超臥室兼辦公室的房間不大，陳設簡單、樸素實用。房間中央，頭南腳北地豎放着一張雙人床，床頭兩側各置一個床頭櫃，右側放一部手搖電話，左側放鬧鐘及手電筒等物；靠南牆的玻璃窗

處，安放了桌面鋪綠呢的大辦公桌；一對扶手小沙發置於東牆邊，沙發中間設一隻茶几，兩個玻璃書櫥靠牆而立；朝腳跟的牆上面，掛着她母親一張放大的半身肖像。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鄧穎超一躺下便面對母親慈愛親切的笑容，可見她對母親孝心至深。此外，房間裡再沒有任何裝飾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左側床旁。

“你到我們這裡來，不必緊張，也不要拘束，可以隨便一些。以後我們會常見面，我向來尊重大夫，我把你們大夫當同志和朋友。我的身體不大好，經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幫助。我同他們合作得很好。”

“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組織上派你到我這兒來工作，你的任務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說道。

少息，她向我介紹了總理辦公室的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和服務員等情況。

“我們這兒人不多，就我跟總理兩個人，無兒無女，沒有家屬給你添麻煩，大家對總理就稱呼‘總理’，這是他的職務；對，他們都叫我‘大姐’；這樣稱呼很隨便，很自然，千萬不要叫我們‘首長’。總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覺得身體好，不在乎，又不聽別人勸。他是個急性子，你跟他說話要簡明扼要，不要繞圈子；以後，你常跟他在一起，就會知道這些的。”她說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裡擺弄着。

“還有，他問你什麼事情，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不懂的就說不懂；只要老老實實，他是不會怪你的。今後，你在工作上遇到什麼不明白，或難辦的事情，可以來問我，我會幫助你的；那些警衛同志也會幫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講完這幾句

話，即側身去拿起手錶看了看說：

“哎呀！快11點多了。好吧，今天咱們就說到這兒，以後我會跟你聯繫，我會盡快找一個機會讓你跟總理見見面。”

鄧穎超伸手按電鈴叫服務員進房間來幫助她起床。

“謝謝大姐對我的關心，向我介紹了這麼多情況；我會牢牢記在心裡，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請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體。您什麼時候需要我，我一定隨叫隨到。”看來談話到此結束，我站起身來。

“等一下，還有件小事情。”她邊說邊向辦公桌走去，從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堅強意志戰勝慢性疾病》為書名的紅色封面簡裝書。大姐說：

“這本書，你拿去看看，我對待疾病的態度都寫在這裡面了。”

我打開扉頁，只見“佐良同志惠存！鄧穎超1965年8月20日”。鄧大姐親自用鋼筆寫的娟秀字跡躍然紙上。我小心地將書放進書包，激動地說：

“謝謝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裡人問好。”鄧大姐伸過手來同我道別。

“謝謝，謝謝。”我用雙手輕輕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邊道謝邊告辭回家。

此後，我有幸在西花廳整整工作了20年。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的親切教誨及言傳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樣做一個光明磊落、正直的共產黨人，正確對待工作和生活態度的問題上終身受益。



1980年5月5日，本書作者和鄧穎超合攝於中南海西花廳。



中南海西花廳。1949年10月至1976年1月，周恩來一直在這裡居住和工作。

2 西花廳。“第二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

西花廳座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統年間修建的那種京城常見的舊王府式四合院建築群。因年代久遠，青磚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紅陳舊，雕樑畫棟亦已褪色斑駁，已不見那昔日王府的豪華氣派。

它由前後兩個院落組成。前院進門不遠處可見一座小假山摒擋路人視線，茂密而細長的修竹環繞着它。院內自南向北的一條彎曲長廊隔在汽車道西側，長廊中段設一涼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盡頭處築一小巧的水榭，池子裡沒有放水，也就沒有魚蟲水草和蓮藕，常年乾涸着。如今西花廳院內的房屋、亭子、長廊、水榭等建築物看來已相當陳舊，但整個院子綠化得很好，樹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齊。院內環境幽靜，空氣清新，略有一點花草芳香，樹上的知了鳴叫不停。

西花廳前院有一個漂亮氣派的前廳，建在約1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來接待與宴請外國賓客的地方。平台下邊有一橢圓形花壇，四周由低矮的常青樹環繞，中央栽着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喜愛的芍藥花和月季花。花壇亦是交通標誌，是來往汽車的環形島，周恩來和鄧穎超常來這裡散步、賞花。

西花廳的海棠花一向為中南海及熟悉總理家的人士所稱譽。每年初夏時節，後院裡的海棠花盛開；每棵樹上開滿了紅色和白色的花朵，引來無數彩蝶紛飛，蜜蜂嗡嗡地叫着，忙個不停。在此優美而寧靜的環境裡，蘊涵着盎然生機。

後院的面積不大，是周恩來辦公與居住區。一片綠地上滿院海棠樹，有幾棵梨樹、桃樹和白皮松。周恩來辦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裡。紅色的廊柱，綠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戶鑲着大塊玻璃；上面是紗窗再加玻璃窗。每當天空晴朗、風和日麗與溫度適宜的時候，打開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開白色的窗幔使陽光直射進來。室內因光線充足，頓時亮堂起來。

周恩來辦公室西隔壁有一個稍大些的房間稱作“活動室”。室內有一張乒乓球桌子，北側與西牆根處立着書櫥，裡邊藏書主要是屬於文、史、哲類的圖書。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將“活動室”習慣地稱之為“乒乓球房”，或乾脆就叫“球房”。這是周恩來在辦公間隙唯一喜愛的活動腿腳的方式，故常有警衛、秘書、醫生陪他打球。因為周總理右臂肘關節傷殘屈曲，活動不方便。我陪他打乒乓球時，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有揮拍抽殺，就像董必武說的，是打“衛生球”。

西廂房為工作人員辦公處；東廂房為臨時“客房”，來客作短暫住宿。我在西花廳20年，只見過周恩來的親侄女在這裡短期住過幾次；此外，未見過別人來住過。

辦公室往東是客廳，現在時髦的說法可稱之為“多功能廳”。周恩來、鄧穎超在此用餐、休息，鄧穎超在此看電視，所以也是兩位房主人在此會客，與親屬團聚的所在。

由客廳往裡（朝東）便是鄧穎超的辦公室兼臥室。鄧大姐的臥

室隔壁是周恩來的臥室，周恩來臥室的東牆外是一條內走廊。這裡有書架，存放一些舊書刊與“文史資料”類圖書。當初設計這條內走廊的人，諒必考慮冬季保溫，夏季隔熱以及隔音的作用。

周恩來臥室內的傢俬陳設極其簡單。因為他一進臥室就上床，身後用枕頭墊着斜靠在床頭便繼續辦公。他睡的是一張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愛的棕繡床墊。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紹興，生長於江蘇淮安，依然留有某些南方人的生活習慣有關。

各房間和衛生間都由內走廊連接出入，走廊出口處是夜間警衛值班室。周恩來進臥室休息後，通向周恩來臥室走廊的門就鎖上了，鑰匙由警衛保管。

周恩來若是夜間找人，只要按枕頭邊的電鈴按鈕，警衛人員會立刻跑到他的身邊。廚師、醫生、護士值班的房間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裡，每個房間都裝有電鈴供隨時呼叫之用。

周恩來居住在西花廳，一直過着儉樸的生活。這從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來。自他住進來以後，不許裝修與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乘總理出國訪問的機會，為了保護與加固建築物，他們搶時間只搞了點簡單的內裝修，更換了窗簾、洗臉池與浴缸。

周恩來回國見了十分生氣，將他們狠狠的批評了一頓。事後，他語重心長的對身邊人員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花那麼多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麼好，群眾怎麼看？一旦大家都學着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周恩來的這一番話發人深省。自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提及裝

修房屋之事了。

周恩來的衛生間被西花廳裡的老同志戲稱為“第二辦公室”。正如鄧穎超所說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幹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

周恩來一天的工作時間是從“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就開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這裡所謂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時刻，甚至到下午一兩點鐘，偶爾會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廳的服務人員一清早便將衛生間打掃乾淨，一切生活用品都備齊。白天拉開窗簾，打開窗戶進行通風換氣；夜間則關上窗戶，拉上窗簾使室內既保持空氣清新，亦使室溫相對恆定。

有人向我介紹，周恩來很注意自身的修飾和儀表。他穿的中山裝及襯衫都熨燙得平平整整、線條筆挺；皮鞋擦得烏亮烏亮的。他花白的頭髮向來梳理得很整齊，隔一天刮一次鬍子，若有外事活動則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邊工作人員的服裝穿戴必須整潔，不可邋邋。這些看來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實質上同周恩來年輕時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後的自身修養、潔身自好有關。對一個領袖人物來說，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說是他個人的“小事情”，因為他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與人民的素質。

有一次，周恩來在衛生間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員的皮鞋比較髒，他就說：“你的皮鞋這麼髒也不擦擦，你沒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員中間傳開了。後來，大家都注意服裝整潔、皮鞋乾淨、及時理髮和刮鬍子。

周恩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習慣與工作安排是，“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便看手錶，他偶爾按電鈴叫人進去，詢問有何急事需要處理；要是時間許可，他也覺得睏乏而沒有睡夠便接着睡。不然，